

贝克特中国化甲子之考

刘爱英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贝克特中国化进程从权威批评家政治化的解读开始, 后由权威翻译家破解困局, 改革开放后进一步由权威学术机构牵头摘帽正名, 而后经历了译介、戏剧和批评实践的交替繁荣。贝克特在中国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文艺界, 也受到了后者的反拨和重塑, 不仅成就了由译介、批评和戏剧实践构成的整体文艺生态及文学文化场域, 也成就了其国际化版图中独具一格的中国化景观。贝克特在中国的文化适应不仅是中西审美视界的重合, 也是由社会现实及未来发展需要驱动而成的历史性的交叠。

关键词: 贝克特; 中国化; 范型; 后人文;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 I562.0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3)02-0057-08

0 引言

2022年是塞缪尔·贝克特走进中国的第一个甲子纪年。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贝克特与中国的互动仅仅只有60年的光景。贝克特中国化的契机早已存在于其作品之中, 有迹可循。笔者以为, 考察贝克特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当着重关照贝克特在中国大陆本土化的三个环节: 其一, 译介实践环节如何完成从外语到中文的汉语化转换。其二, 批评接受环节如何实现从文学语言到思想的审美转换。其三, 戏剧实践环节如何实现从思想到实践的转变, 包括结合当下现实做出的改造和重塑, 以体现戏剧创新的审美价值和实用功能。

从196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程宜思的《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算起, 贝克特与中国文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整体上可以用“一甲子与时偕行”来概括。贝克特的中国化因为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等基本现实因素而具有了鲜明的本土特色。以改革开放和贝克特百年诞辰为标记点, 在60年的理论和实践层面贝克特都渐渐从纯粹的“在中国”过渡到了“中国样式”, 逐渐被打上了中国大陆的本土烙印。这其中的曲折和转机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重要的历史节点紧密相关。贝克特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文艺界, 而且也受到了后者的反拨和重塑, 不仅成就了由译介、批评和戏剧实践构成的整体文艺生态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场域, 也成就了其国际化版图中独具一格的中国化景观。

1 一场错位时空里的遭遇

1962年, 贝克特走进的是一个跟他的世界几无交集的错位的时空。贝克特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

收稿日期: 2022-09-11

作者简介: 刘爱英,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语文学、贝克特戏剧及戏剧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 刘爱英. 贝克特中国化甲子之考[J]. 外国语文, 2023(2): 57-64.

超前性,理解其美学思想和文学实验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开放程度还是文艺理论和实践以及时代精神面貌,都与贝克特所处的西方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样态。当时的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交流整体上极其有限,带着“荒诞”和“反”(counter-)的标签,贝克特自然跟当时我国唯一一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并以一定的篇幅刊发中国学者评论的重要刊物《译文》失之交臂。

贝克特不但无法同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艺思想产生共鸣,而且还同当时的主导范型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无论是程宜思的《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1962)、董衡巽的《戏剧艺术的堕落——谈法国“反戏剧派”》(1963)还是《世界知识》发表的丁耀瓚的《西方世界的“先锋派”文艺》(1964),批判的重点都是贝克特所代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及其荒诞不经的形式,认为贝克特彻底的反戏剧所表演的是“人的死亡”和“被判决了的世界等待着末日的到来”(程宜思,1962:5)。囿于时代,这些文章未能厘清贝克特美学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也未在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客观而辩证地看待贝克特进行的文学实验及其价值和意义。然而,中国权威批评家毕竟对贝克特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反应,而且早于翻译家对贝克特做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判断。同时,这样的批评反应能出现在权威的媒介上,这本身即是对贝克特国际影响的某种肯定。当然,贝克特在新中国的出场亮相带有高度政治化的色彩,而这对于贝克特中国化潜在的可能性及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一定会产生阶段性的重大影响。当散发着浓厚的超现实主义气息的贝克特在20世纪60年代走进中国时,他必定会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框架中迎来一场意识形态的遭遇战。而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贝克特悖论式地踏上了自己的中国化旅程。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早期的政治批判范型限制了贝克特作品的译介,制约了政治批判之外的解读视角,进而封闭了走进贝克特世界更多可能的通道。固然,在当时学术封闭、研究滞后的大气候下,批评的僵化、类型化、单一化是难免的结果。不过,这种学术的沉闷状况同西方批评界在经历过批评的繁荣之后陷入的僵局还是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刘爱英,2006:145)。

贝克特中国化迎来的第一个里程碑是1965年施咸荣翻译的《等待戈多》。由于译著以“黄皮书”形式发行,在当时鲜为人知,但该译著后来产生巨大影响,从CNKI 1,087条跨越11个学科的检索结果中可窥一斑。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贝克特早期特批评基本上都是对《等待戈多》这一部剧作进行的研究。时至今日,《等待戈多》也是贝克特作品中最受中国戏剧人偏爱的,其主要还是因为《等待戈多》是贝克特剧作中第一部汉语译作。

由于缺乏版权意识,欠缺文献档案意识等,围绕着译作的翻译底本、底本版权信息等问题产生的困惑也相伴而来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人知道该译本依据的法文原作(施亮,2006:89)。与贝克特中国化之“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时期贝克特国际化之“热”,他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声望和地位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 去政治化:戈多等来了“摘帽”和“正名”

贝克特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正名的契机,在中国的批评、译介和戏剧实践中迎来其研究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并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开始与中国社会、文学和文化的切实互动。贝克特中国化走出困局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学术反拨。1978年11月下旬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整体上有

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并为贝克特摘了帽,翻了案:《等待戈多》等作品“貌似荒诞,但寓意深刻,暗喻戈多对现实的失望,在等待着变革,等待着新的希望,因此,从认识作用来讲,这些作品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施亮,2006:89)。此番摘帽正名标志着贝克特作为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在中国的文学文化中开始得到正面的认可,也预示着贝克特的中国化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即贝克特将以通道全开的方式走进中国的知识界和大众文化,并在后者的批评反应以及为应对新的局势而做出的艺术改造和重塑中焕发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围绕文艺的功用展开的大讨论,促成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外国文艺观,而贝克特不仅出现在中国大学的教材中,也出现在面向大众的出版物中。“《等待戈多》数次被转载,比如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集》《世界经典戏剧全集》里都被选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又重新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施亮,2006:89)1993年6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施咸荣生平与学术座谈会”进一步将《等待戈多》列为英语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而包括施咸荣在内的翻译家“为中国文学界的震惊、自省、冲出文化专制的禁锢,迎接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推波助澜,功不可没”(赵梅,1993:159-160)。毫无疑问,权威的学术机构和出版社在推动贝克特中国化方面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新增译作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贝克特剧作,《当代外国文学》1981年第2期收录《啊,美好的日子!》(*Oh les beaux jours*)和《剧终》(*Fin de partie*),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选》收入《被逐者》(*L'Expulsé*),《外国文学报道》1983年第3期发表《归宿》(*La fin*)。这些早期译作的导读对于读者推开贝克特文学世界的大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突出的仍是贝克特的荒诞标签和资本主义呈衰退之势的主题。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集》在前言中有专门论述,探讨《等待戈多》一剧荒诞的意义以及荒诞的存在状态,同时配发两张剧照形象地宣示了这一主题。译介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仅有三部贝克特的作品被译为中文,即《最后一盘录音带》(*La Dernière bande*)、《镇静剂》(*Le calmant*)以及“无论对理解普鲁斯特,还是对理解贝克特都很有意义”的《普鲁斯特论》(*Proust*)。贝克特学识广博、创意独特、文字艰深,对译者、研究者和读者都是极大的挑战。《普鲁斯特论》译文的出现,可以说为后来更多的批评透过“普鲁斯特的方程式”洞悉贝克特的世界打开了崭新的学术思考空间。

与同时期译介工作的艰难推进相比,学术研究在一批有影响力的期刊和学报的带动下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荒诞热”(张和龙,2010:39)。《中国戏剧》《戏剧艺术》《戏剧文学》《外国戏剧》《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文艺研究》等刊物似乎是一拥而上,然而所刊发的文章大多离不开对荒诞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手法的分析。贝克特中国化的初期批评更加受制于中国社会艰难转型过程中理论和批评方法多样性整体缺失的无奈现实。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贝克特在中国批评界、知识界的接受已经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变化。戏剧研究中有两项成果展现了不同的视角。蒋庆美的《贝凯特及其剧作》(1981)探索了贝克特打破戏剧常规的实验精神和形式特征。尹岳斌的《略论〈等待戈多〉及其它》(1983)则主要从哲学的视角,探讨了剧作中的非理性和反逻辑。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在规模上虽难以同戏剧研究媲美,但出现了新的视角和思路。瞿世镜分析贝克特的小说和戏剧的共性,直击其“反传统特色”的共核(1983:22);刘重德(1984)对“反小说”“新小说”、潜意识等的探讨也给人眼前一亮之感。然而与同时期西方多姿多彩、声势浩大、蓬勃发展的贝克特批评产业相比,国内的贝克特研究总量小,方法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贝克特批评渐入佳境,视野更加开阔,手法更加丰富,观点更加新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走向纵深,国内的西方文论热也持续发酵,为贝克特中国化赋予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批评反应仍主要集中在小说和戏剧上,成果的数量和规模也不尽如人意,但新的批评视角、批评方法不断涌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且都努力深入探索贝克特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就包括陆建德的《自由虚空的心灵——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创作》(1994)。这是中国学者对贝克特的客观而深刻的诠释,为贝克特研究发展方向及新范型的确立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侯维瑞的《寓真实于荒诞:试论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小说》从贝克特的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名者》)中洞悉到荒诞是其戏剧与小说的最大公约数,颇有新意(1998:44)。此时的戏剧批评也跨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有的成果重点考察时空关系,有的则把重复、理性与非理性的螺旋式循环视作《等待戈多》中的根本性结构特征(李伟昉,1993;舒笑梅,1997;龙昕,1999)。当然,西方文论热中的中国学术似乎顾不上从本土视角来关照贝克特。

八九十年代,贝克特在中国走向本土化最抢眼的表现莫过于其对中国先锋派戏剧的影响。相较于学术界在本土视野上的创新乏术,在创作的焦虑和渴望中苦苦探索的中国戏剧人似乎对贝克特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更加敏感,并在其中发现了洋为中用的契机。《等待戈多》搬上了中国的舞台,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大众能够接触到的唯一一部贝克特的剧作。同时,与西方荒诞派戏剧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该剧也是上演频次最高的。《等待戈多》对中国当代戏剧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而贝克特也成为国人眼中荒诞派戏剧的核心人物(Lin et al., 2011:416)。戏剧理论家杜高指出:“正是施咸荣翻译的《等待戈多》,把西方荒诞派戏剧介绍到中国,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戏剧界,并由此在北京、上海出现了面目一新的先锋舞台剧,进一步推动了戏剧的改革。”(苏榕,2004)

贝克特素以严格、苛刻著称,“当他得知导演犯了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或是肆意篡改他的作品时,他感到非常震惊,非常气恼,甚至会暴跳如雷”(诺尔森,2006:101)。中国的戏剧家们也许并不了解贝克特的这一侧面。事实上,他们几乎不看重忠实于贝克特原作的问题,而更在乎如何反常规、反权威,并借助贝克特来表达当下的重大关切。故此,贝克特在深刻影响中国第一代先锋派剧作家戏剧实验的同时,也在后者的本土化改造中接受极具中国特色的致敬。例如,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陈加林版《等待戈多》在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加入了中国文化的调“味”品,展现了中国戏剧的民族特色——演员用翻滚跌扑的动作置换了枯燥无味的停滞,其音乐、舞蹈、京剧做派显然与原汁原味的《等待戈多》有天壤之别(Lo, 1989:237)。

带着20世纪80年代一枝独秀的威力,《等待戈多》开始在中国的戏剧实验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同时也在思想大解放的洪流中接受了中国戏剧家们大胆而颇具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改造。1991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小礼堂上演的由孟京辉执导的校园剧《等待戈多》可以说是贝克特中国化的一个典型范例。从待业青年苦闷、压抑的等待,到理想幻灭的主题表达,再到音乐中儿歌的运用等等,孟京辉用典型的贝克特式荒诞观照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中国戏剧界引起了轰动。2007年孟京辉执导的喜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仍然保持着贝克特标签式的荒诞精神和形式,是《等待戈多》经过中国本土化改造的翻版。1998年任鸣利用酒吧场景设计、人物形象塑造、女性演员的启用、时尚的模特、生活中的困顿感、对改变的渴望等当代中国的生活现实、话题和元素重塑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彰显女性主义议题。同年,林兆华在嫁接契诃夫的《三姐妹》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同时也对不同时空女性的存在和命运发出了类似的追问。

3 贝克特中国化走进大视界

进入 21 世纪,中国在全球化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不断加大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投入。近年来,整个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贝克特的中国化也走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格局之中,见证中国与世界同步交织、同步激荡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公立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等共同推动下,贝克特中国化走向新的高度。一方面,专著类成果不断涌现。其中,王雅华以《走向虚无——贝克特小说的自我探索与形式实验》(2005)、《不断延伸的思想图像:塞缪尔·贝克特的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2013)连续对贝克特美学思想的动态生成及其在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实验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探索。曹波在《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2015)中重点探索贝克特小说的失败美学,即贝克特如何超越乔伊斯的影响全面走向无知、无能、无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依托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省市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等平台形成了很有分量的专著类及论文类成果,出版呈现繁荣之景,如张世民的《重塑文学性:贝克特文学叙事多元艺术媒介研究》从跨越艺术边界的思路,分析了贝克特如何利用视觉和听觉感受塑造心灵景观,从而对文学性进行重构。

从总体趋势来看,贝克特中国化实现了在中国的教材、大学外语教学和各种讲座中的存在常态,也走近了大学生和青年学者,出现在大学生和著名戏剧团体的演出话剧里,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化实践的核心人物(Liu, 2021:238)。不仅如此,国内贝克特研究的规模、成果数量及品级都在不断提升,产出了一些跨学科、跨文学类型、跨艺术类型且颇富创意、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成果。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例,曹波的《回到想象界》(2005)运用了“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刘爱英的《塞缪尔·贝克特:见证身体之在》(2007)以身体理论话语为研究框架,施清婧的《中国舞台上的塞缪尔·贝克特——跨文化戏剧演出研究(1964—2011)》(2013)抽取中国各地各个时期的 14 个贝克特戏剧演出为案例加以分析。论文作者都尝试从新的理论和批评视角对贝克特的诗学、戏剧美学、跨文化戏剧实践的表演环节等做出全新的阐释。

在外语相关专业的论文中,贝克特出现的频次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期刊论文中代表性的成果不但快速跟进国外理论话语及批评手法,并将之运用到贝克特各时期、各类作品的评析之中,且在批评范型上显示出与之前不一样的独特眼光。如舒笑梅在《电影语言在贝克特剧作中的运用——从〈最后一盘录音带〉谈起》(2002)中清楚地诠释了贝克特如何在剧作中跨越媒介的界限。在《突破现代派戏剧的艺术界限——评萨缪尔·贝克特的静止戏剧》(2003)中,冉东平深度剖析了贝克特如何消解戏剧性,如何用去中心的戏剧结构造成现实与历史的断裂以及人物主体性的消失。而何成洲则在《贝克特:戏剧对小说的改写》(2003)中从人物、语言、意向等侧面考察了贝克特的戏剧与小说之间的自书式关照,并在《贝克特的“元戏剧”研究》(2004)中从戏中戏、自我意识以及剧作中的戏剧评论等出发分析了贝克特代表性剧作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表达。同时权威核心期刊也推出了一系列代表性的成果。如沈雁在《贝克特戏剧的男女声二重唱——论〈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和〈快乐的日子〉》(2007)中从主题、叙事手段、语言表达切入,深刻分析了贝克特两部剧作间的互文性特征。雷强的《“言无言”——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语言哲学思想》(2010)主要依托奥地利哲学家毛特纳的思想,对贝克特的“语言困境”刨根问底,剖视了贝克特中后期作品中的荒诞、无序之感。朱雪峰在《贝克特后期戏剧的时空体诗学》(2011)中则提出,贝克特的戏剧美学在其创作后期走向了以非语言、非叙事艺术、

反戏剧常规为主要特征的全新的时空体诗学。近期成果中,郑杰的《生产之物:贝克特的录音带》(2021)综合了多个学科专业的理论,剖析了贝克特在《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呼吸》和《摇篮曲》中如何审视物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而陈畅的《“我不属于大世界,我属于小世界”——贝克特作品中的自然意象溯源》(2021)则结合贝克特作品中的石头、泥土等自然意象,对形成贝克特美学理念至关重要的思想、宗教、文化源头追根溯源。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学者对贝克特国际化景象中的物转向、后人文转向等较新的研究范型做出的主动而有力的响应。

新时期的另一个新气象是翻译出版的大体量和大成就。译介方面的进展无疑是空前的。在此之前,仅有七部作品有了中译本,20世纪60年代一部,20世纪80年代四部,20世纪90年代两部。2002年裘志康翻译的《一个黑夜》发表于《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英国卷(下)》,成为国内无底本版权信息最后一个贝克特作品译作。2006年起,各层级的翻译项目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划项目为贝克特中国化能够走近大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2006年贝克特百年诞辰之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贝克特选集》,收录了贝克特大部分的法文作品。尽管全套译著的“语言品质和学术水准”可能参差不齐(Lie, et al., 2009:140),但却成了贝克特中国化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里程碑。2011年迎来了由余中先、赵家鹤翻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贝克特选集》,2012至2013年迎来了湖南文艺出版社五卷本的扩充版——十一卷本的《贝克特作品选集》,升级后的译著更是增补了两部贝克特的早期英语长篇《莫菲》和《瓦特》。2016至201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的22卷本的《贝克特全集》,收录了贝克特用法语和英语创作的戏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学评论等作品,完成了贝克特在中文世界的第一次全景式呈现。在为《贝克特全集》撰写的总序中,S. E. 贡塔爾斯基写道:“随着现在这套中文版‘贝克特全集’的出版,贝克特便成为更加完整意义上的‘世界性的’作者,这不但是因为他的作品现在将会增加十多亿潜在的读者,而且还因为他的作品将会与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学和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生根萌芽,开花结果。”(2016:21-22)这是将贝克特中国化置于其国际化框架中做出的准确研判和精彩预测。此后的事实证明,贝克特中国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已然不可逆转。201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贝克特书信集》(全四卷)汉译选题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出版图书,2021年第一卷正式出版,翻开了贝克特中国化崭新的一页。

在新时期的格局里,戏剧实践环节既有贝克特的原汁原味呈现,也有中国戏剧人对贝克特进行的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动因的改造和重塑,更有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展现出的与时偕行的大情怀。贝克特诞辰百年纪念前后,外国著名导演和戏剧团体来华访问、演出,执导贝克特的剧作,甚至举办艺术节,将原汁原味的贝克特带到了中国。在本土化的改造中,新时期的话剧不再刻意突出反叛和抗争的主题,而是更加看重通过拼贴、戏仿等手段将贝克特戏剧中的实验精神与中国现实话题结合起来,营造充分的喜感,进而探索本体、经济、文化等意义上的生存与死亡主题,包括中国话剧市场本身面临的生存危机。2014年罗巍导演的《等待·戈多》用人际关系置换了贝克特的等待主题。就女版的《等待戈多》而言,无论是2001年上海真汉咖啡剧场的表演,还是2015年冯远征在天津大剧院执导的演出,突出的无疑是女性主题。编导们在前期话剧实验基础上持续追问女性主义的议题,并反思消费大潮中女性作为消费主体所处的尴尬境地。不过,这其中也有应时创新的考量,即以女版新剧为试金石,探索话剧和文艺团体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如何才能谋生求存。这些中国戏剧人对贝克特做出了契合时尚话题、符合现实需求、满足戏剧实验需要,或者彰显时代精神的重塑。必须看到的是,这样重塑的《等待戈多》并非完全是“东西方文化诉求的差异性”造成的结果。

4 结语

毋庸置疑,贝克特的中国化仍将继续下去,他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不但会是持久的,而且会是与时俱进的,尤其会在新的挑战到来之时或者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紧要关头为人们走出困境给出艺术的应对办法。正当整个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剧场与演出行业几乎全面停摆。2020年4月,广州大剧院、腾讯视频艺术频道共同推出王翀执导的首部线上戏剧《等待戈多》,旨在“挑战戏剧创作新模式,打破传统戏剧的空间限制和疫情带来的地域隔阂和心理隔阂,为戏剧艺术做出全新的探索与实验”(王润,2020)。为应对突如其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国戏剧人诉诸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帮助人们寻求精神慰藉以及克服孤独、战胜疫情的勇气,表现出敬畏生命、以人为本的大情怀。

一甲子间,贝克特的中国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而经历了译介、戏剧和批评实践的阶梯式上升和阶段性交替繁荣,划出了一道从低到高的历史轨迹。汉语化让贝克特的作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Van Hulle, 2021: xxvii)。贝克特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定会显现西方社会文化的基因性特征,也必定会推送、传播贝克特所代表的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如荒诞派美学、失败美学)、文学批评实践及戏剧实践方法。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现实以及文艺美学的文化性积淀必定会要求贝克特“本土化”。这就是说,贝克特的中国化不应该只是其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文艺美学对中国文艺产生单向的全面影响,而应该关涉学术创新、艺术创新、文化互动等问题。

如果说中国戏剧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准则的同时已经对贝克特做出了适时的文化调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文化互渗的补偿,那么西学的单向性影响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国内贝克特批评的薄弱环节。而要破解思维的定式,中国学界仍需作出更多的思考、探索和努力。就本土化而言,国内学界能否另辟蹊径,在充分利用本土文学与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视角”?能否在贝克特与中国的文学、哲学、戏曲、话剧之间的跨文化、互文性关联等方面拓展出新的学术空间?贝克特全集以及书信集的相继出版无疑会让越来越多的贝克特作品逐渐走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因此,翻译研究、译文比较、戏剧实践无疑都是值得关注的学术成长点。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与时偕行的贝克特又会激发中国戏剧人怎样的创新意识?贝克特已经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文艺界,也经受了后者的反拨、改造、重塑,甚至误读,不仅成就了由译介、戏剧和批评实践构成的整体文艺生态和文学文化场域,也成就了中国贝克特批评的传统并且奠定了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世界经典作家地位,更成就了其国际化版图中独具一格的中国化景观。贝克特与中国的文化互渗不仅仅是某些审美视界的重合,更是在社会经济现实以及未来发展需要的推动下促成的历史性的交叠。

参考文献:

- Lie, Jianxi & Mike Ingham. 2009. The Reception of Samuel Beckett in China [G] // Mark Nixon & Matthew Feldman. *The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of Samuel Beckett*. New York: Continuum.
- Lin, Lidan & Zhang Helong. 2011.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Samuel Beckett (1906-1989) [J]. *Irish Studies Review* (4): 413-425.
- Liu, Aiyang. 2021. From Bits and Pieces to an Ensemble: Translating Samuel Beckett in Mainland China [G] // José Francisco Fernández & Pascale Sardin. *Translating Samuel Beckett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Lo, Irving. 1989. *Waiting for Godo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Journal of Beckett Studies* 11&12: 236-239.
- VanHulle, Dirk. 2021. Praise for Translating Samuel Beckett Around the World. *Translating Samuel Beckett Around the World* [G] // José Francisco Fernández & Pascale Sardin. *Translating Samuel Beckett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 E. 贡塔尔斯基. 2016. 永远的塞缪尔·贝克特[M]//贝克特全集:第1卷总序. 刘爱英,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 程宜思. 1962. 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N]. 人民日报. 1962-10-21(5).
- 侯维瑞. 1998. 寓真实于荒诞:试论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小说[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4-47.
- 刘爱英. 2006. 贝克特英语批评的建构与发展[J]. 外国文学评论(1):138-146.
- 瞿世镜. 1983. 贝克特的“反小说”[J]. 外国文学报道(3):22-27.
- 施亮. 2006. 关于黄皮书[J]. 博览群书(4):89-90.
- 苏榕. 2004. 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引出话题——充分评价老一代翻译家历史贡献[N]. 中华读书报. 2004-11-17.
- 王润. 2020. 《等待戈多》挑战戏剧创作新模式[N]. 北京晚报. 2020-04-03.
- 张和龙. 2010. 国内贝克特研究评述[J]. 国外文学(3):37-45.
- 赵梅. 1993. “施咸荣生平与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J]. 美国研究(3):157-160.
- 詹姆斯·诺尔森. 2006. 贝克特肖像[M]. 王绍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Localization of Beckett in China (1962–2022)

LIU Aiyang

Abstract: The trajectory of Becket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began with politicized readings by authoritative critics, and turned upward with Shi Xianrong's translation of *Waiting for Godot* and criticisms by authoritativ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s the country implemented the opening-up policy, going through the alternate prosperity of translation, theatrical practice and criticism in changing paradigms. While making impact on China's intellectu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when China was at some crucial moments, Beckett was also reshaped by the latter. The resulting ecospher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literary culture constituted a scene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eckett. The acculturation between Beckett and China is a process of both integrating Eastern and Western aesthetic visions and accommodating the historical needs driven by current social realit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ckett; localization; paradigm; post-humanism; acculturation

责任编辑:龙丹